哲理性军事问题

综述篇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军事哲学研究概述

军事哲学是一门以军事整体为研究对象，以揭示军事的共同本质和普遍规律为基本任务，旨在建立关于战争观、军事观和根本军事方法论的理论体系的基础理论性学科。它既属于哲学与军事科学之间的跨层性边缘学科，又属于军事科学中各门具体学科的概括性综合学科，同哲学、军事科学各门相关学科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和严格的区别。军事哲学在军事科学体系中处于最基本的理论基础的地位，对军队建设、国防建设和作战活动起着理论指导的作用。

虽然军事哲学思想早在人类逐渐进入文明时代起就开始孕育萌发，并随着社会的进步不断地演变、发展而日臻成熟，但军事哲学作为一门学科逐渐建立起来，还是直到现代才出现的事情。20世纪，人类社会无论在经济、政治、文化、科技领域还是在整个军事领域，都得到了巨大的革命性的发展，尤其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两次军事革命的展开，有力地推动着现代军事哲学思想的革新和完善。这方面，不仅苏联（俄）、中国、美国等有突出的表现，其他如西欧、日本、印度等亦迈出了一定的步伐。例如，早在20世纪20年代，当时苏联就开始广泛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在军事上的运用，六七十年代在军事哲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出版了不少的著作，其中有的著作还在中国翻译出版。俄罗斯重新建国后，又把这种研究同当代军事活动的实际结合起来，继续推动着军事哲学研究的现代化；在美国，军事哲学研究深受实用主义哲学等西方哲学流派的影响，针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

的战争实践尤其是当代战争与新军事革命中出现的问题，不断地从哲学层面上总结与反思军事领域的各种变化，出版与发表了许多军事哲学方面的著作和论文，其中亦有不少被介绍到中国来。

不过，在促使军事哲学研究的系统深化与建立学科体系方面，现代中国做出了更为突出的贡献。尽管长期的封建统治和受到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因素的制约，使得中国在 15 世纪中叶以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未能把古代辉煌的军事哲学思想传统（如孙子兵法等）继续发扬光大，自 1840 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此种情形愈加明显。然而从 19 世纪末开始，由于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与抗击八国联军入侵中遭到失败，逐渐唤醒了一批先进的有识之士，掀起了一股学习西方，实行“新政”，开办工业与创练新军的热潮，因此大大促进了中西军事哲学思想的交流与融合。特别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于 1911 年举行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年来的封建统治，提出了许多新的军事思想与纲领，把中国近代军事哲学思想推向了新的高峰。例如，孙中山揭示了民族与战争、民权与战争、民生与战争的关系，明确提出了三民主义战争观与武装革命的纲领，主张贯彻以民富国强为主旨的国防建设思想。民国时期，无论是军阀混战、全民族抗日战争，还是三次国内革命战争，都为中国现代军事哲学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深广的军事活动基础。一方面是国民党领导的军队及其从事的军事活动，产生了诸如蒋介石、蒋百里、杨杰等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军事哲学思想，出版了许多有关的著作，如蒋百里的《孙子新释》、《军事常识》、《国防论》,杨杰的《国防新论》、《军事与国防》等；另一方面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及其从事的军事活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产生了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军事哲学思想，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与战略》、《论解放区战场》等著名的军事哲学著作

论文，以及《矛盾论》、《实践论》等包含深刻军事哲学思想内容的哲学著作。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普遍地、持久地、深入地开展了学习与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热潮，包括新中国十大元帅在内的许多著名军事家，亦从不同的角度与方面丰富着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从而使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进一步得到了发展，并形成了一定的科学体系，诸如辩证唯物主义的战争观、实事求是的军事认识论、发展的战争指导论、丰富的军事辩证法思想与科学的军事方法论等。

尤其自 20世纪 80年代以来，中国对军事哲学的系统化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繁荣时期。一方面，邓小平等根据时代的变革、国际战略格局的演化和中国在新历史发展时期的总任务，对军事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要求不断进行新的探索、新的实践和新的总结，除创造性地制定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军、作战的方针、原则外，还提出了许多包含深刻哲理的军事理论观点，从而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邓小平军事哲学思想，如实事求是的军事认识论、新的战争与和平观、现代大国防观以及辩证的军事建设思想等。随后，江泽民在此基础上，对新时期建军与作战等问题又作了进一步的阐发与论述，尤其是关于当代战争与和平、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军与科技强军、积极防御战略与打赢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等，得出了一系列唯物辩证的结论。显然，邓小平军事理论与江泽民军事论述中贯穿的深刻哲理，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体系；另一方面，中国学术界在改革、开放大潮和当代高技术战争新潮的推动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军事哲学研究高潮，不仅在各种报刊、杂志上可以看到数以百计的有关论文，而且先后出版了二三十部军事哲学方面的专著，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著述如：《军事唯物辩证法》（高体乾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5 年出版）、《军事思维学论纲》（毕文波等主编，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出版）、《军事方法学》（梁必骁著，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国防大学出版社 1990 年出版)、《军事哲学原理》(王成业等主编，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0 年出版）、《邓小平新时期军事哲学思想》（林英家等著，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1 年出版)、《中西军事哲学比较研究》（张俊波主编，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3 年出版)、《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史》（陈鸿猷等主编，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3 年出版）、《军事认识论》（张家驹等主编，解放军出版社 1994 年出版)、《军事哲学》(梁必骁主编,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5 年出版)、《高技术战争哲理》（梁必骁等著，解放军出版社 1995 年出版)、《军事战略思维》（李际均著，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6 年出版)、《新军事革命论》（高春翔主编，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6 年出版)、《新战争论》（沈伟光著，人民出版社 1997 年出版)、《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认识论方法论》（傅立群主编，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7 年出版）、《军事哲学思想史》（梁必骁主编，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8 年出版）等等。另外，在 1988 年军事科学院招收军事辩证法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基础上，该院从 1992 年起开始招收军事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后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又于 1996 年起开始招收军事哲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同时，许多军队指挥、政治院校亦招收了这个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并为其他专业的研究生开设了军事哲学课程。所有这一切，不仅奠定了军事哲学学科地位的广泛基础，而且表明这门新学科终于在现代中国的大地上诞生了。

其中，1995 年《军事哲学》一书的出版（梁必骁主编，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5 年出版），是军事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真正确立起来的重要标志。该课题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科研规划的重点项目之一，是由军事科学院、陆军指挥学院、空军指挥学院、第二炮兵指挥学院、海军政治学院、空军政治学院、军事经济学院等单位的有关专家、教授共同完成的。全书 58 万多字，分为导论、军事本质论、军事运动论、军事认识论、军事指导论、军事哲学方法论与结束语七大部分，既明确了军事哲学的研究对象和学科性

质，又系统阐发了军事哲学一系列的概念、范畴、规律、原理及其理论体系，还探讨了军事哲学今后发展的趋势。课题完稿后，由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和野战部队领导等联合组成的评审委员会，对书稿进行了认真的全面鉴定，大家认为这是一部“具有开创和填补空白性质的军事哲学专著”，该书“在广泛吸收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了更高一级的综合和概括，使军事哲学学科从名称、基本范畴、内在结构到整个体系，都得到了更新和改造，在科学化、系统化上迈出了新的一步”,并且“本书对军事哲学作了正确的定位，通过对军事实践和军事理论的总结、概括而提炼出军事哲学问题，建构起军事哲学理论体系”，这种“以军事本质论、军事运动论、军事认识论、军事指导论与军事哲学方法论为基础的军事哲学理论体系”，“以及得出的一系列新结论、新概念，标志着这门学科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和新的发展”，因此，认为该论著不仅“为军事哲学这个新兴的哲学学科作了开创性工作”，而且“对于指导部队的训练、战备及作战指挥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该书出版后，军事科学院领导根据党中央、中央军委一再强调干部要加强理论学习的要求，决定将该书发至全军军以上单位和领导干部。而且，军事科学院以及全军许多院校，先后将该书列为硕士、博士生专业课程教材或参考书。与此同时，全军部队、院校以及地方关心国防事业的人员亦争相购买此书，全部印书很快便销售一空。事实充分说明，《军事哲学》的出版发行，对端正人们的战争观与军事观，革新军人的思维方式和提高其科学思维的能力，学会从哲理的高度研究军事问题和科学地指导各项军事实践活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应该指出，当代中国军事哲学研究的发展，乃是一个不断争鸣、不断深化、不断创新的过程。由于中国学术界对军事哲学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基本内容和体系构成、功能特征等，始终存在着诸多的不同看法，因此如何通过这些不同见解的讨论与研

究，逐渐深化和完善军事哲学理论及其体系，成了军事哲学能不能完全确立并使其成为学术界共识的关键所在。例如对以下一些问题的解决就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军事哲学的学科称谓问题。长时间以来，中国一直习惯于用“军事辩证法”的称谓，来涵盖军事哲学方面的内容与理论体系。但随着军事哲学研究的深化，并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新学科之后，究竟是沿用“军事辩证法”还是改用“军事哲学”作为学科称谓的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坚持叫“军事辩证法”的意见认为：①军事辩证法的概念，早在 1936 年就由毛泽东提出来了，几十年来一直沿用这个名称，已为大家所习惯和接受；②突出了军事领域的矛盾运动特点，在揭示军事矛盾运动的普遍规律时，理应包括军事唯物论、军事认识论的内容；③“军事辩证法”明确标示了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的唯物辩证性质，而不像“军事哲学”是个中性词，还可以是唯心的、形而上学的。建议改称为“军事哲学”的意见则提出：①“军事辩证法”的涵义过于狭窄，顾名思义是指军事领域的辩证法问题，如把军事本体论、军事认识论等全包进去，显得比较牵强，不如叫“军事哲学”更名副其实；②军事哲学不仅仅指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思想，理应包括古今中外的军事哲学思想，叫“军事哲学”有利于扩大研究的范围与视野；③学科的称谓不能老是用“约定俗成”的办法固化，习惯叫法如果不能适应学科的新发展，就应改称新称谓，等。《军事哲学》一书原则上肯定了后一种见解，并从学科分类、学科内容与学科发展三方面，论证了用“军事哲学”作为本学科称谓的合理性与科学性，但认为“军事辩证法”作为一个重要概念，将继续存在于军事哲学的理论体系之中。

军事哲学的学科性质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有过这样几种见解：有的强调军事哲学的哲学性质，认为它属于哲学的在军事领域的具体应用，是一门应用性分支哲学；有的强调军事哲学的军

事性质，认为它属于军事科学的范围，甚至可以作为军事科学的概论；还有的强调军事哲学的中介性质，认为军事哲学实际上是哲学通向军事科学的中介和“桥梁”，等等。参加撰写《军事哲学》一书的专家、教授们，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认真的研讨，一致认为军事哲学的学科性质，受制于它的研究对象和基本内容。基于军事各个具体的方面、层次和部分，均有各门具体的军事学科或门类性军事学科去研究，唯独关于军事整体的本质、规律和指导问题，需要一门概括性、综合性学科进行研究，这个任务便历史地落在了军事哲学的肩上。因此，军事哲学要研究和解决的基本问题为：军事是什么？军事领域存在哪些普遍规律？如何正确认识与指导军事活动？等。根据这种见解，也就决定了军事哲学乃系一门扎根于军事活动土壤中的特殊性哲学。它固然离不开哲学的影响与导向，哲学作为一般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构成了军事哲学的指导思想，然而其理论却奠定在军事实践与认识活动的基础上，一方面是对各个具体的军事学科知识、方法的最高概括，另一方面又对各门具体军事学科与各种军事活动起战争观、军事观及其方法论的指导作用。

军事哲学的逻辑起点问题。从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出版的一系列军事哲学专著和发表的论文来看，人们对军事哲学理论体系究竟以什么作为其逻辑起点的问题，可谓各有各的见解和理由，颇有百花齐放之感。其归纳起来大概有这样几种：认为“战争目的与战争手段”是战争运动的基本矛盾，既是军事哲学中最普遍、最本质的问题，又是战争历史的起点，可作为军事哲学的逻辑起点；认为“消灭敌人与保存自己”是贯穿整个战争、战役、战斗始终的基本矛盾，一切军事行动都必须围绕它来展开，因而这才是军事哲学的逻辑起点；认为“战斗”是组成战争的细胞，是战争中最简单、最常见、最基本的活动，其他不过是它的继续和扩展，以此作为军事哲学的逻辑起点比较合适；认为“战争”、“战争性质”或“战

争运动”是军事哲学的逻辑起点，因为军事哲学就是关于战争活动的哲学，上述概念可作为整个理论体系最基本、最抽象的概念来运用 认为把‘军事’‘军事本质’或‘军事运动’作为逻辑起点更合适些，因为这几个概念比上述关于战争等概念显得更抽象，可在内容上创造出比战争哲学更丰富的理论体系，等等。《军事哲学》一书认真考察了这个问题，在分析、研究军事领域存在的各种矛盾之后，找出了敌我之间的对抗才是贯穿整个军事领域始终和各个方面、并区别于其他社会领域的基本矛盾，而“敌我对抗”概念正是对这一客观存在的真实反映，它揭示了军事活动特殊的历史起点和最普遍的本质属性，属于最基本、最简单、最抽象的基本概念，由此可以推演出军事哲学的各种范畴、规律和原理，因而以此作为军事哲学的逻辑起点最为恰当了。

军事哲学的范畴形成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学术界同样存在不同的认识。有的从军事哲学是哲学在军事领域的具体应用这一观念出发，认为军事哲学没有必要形成单独的系列范畴，只需用哲学的范畴、规律、原理来说明军事问题就可以了。也有的主张通过哲学范畴军事化来获得军事哲学范畴，诸如物质与意识、运动与静止、主观与客观、实践与认识、必然与偶然、本质与现象等，前面加上“军事的”这一定语即可。还有的认为军事哲学既然是一个独立学科，就不能搬用哲学范畴，而应将所用的军事概念不断加以概括和抽象来获得军事哲学的全部范畴。《军事哲学》吸收了以往关于军事哲学范畴形成的研究成果，认为军事哲学的范畴及其体系应包括三个方面：①凡哲学与其他一般性科学的范畴，只要普遍适用的，就可以直接借用或经过改造成为军事哲学范畴；②凡军事科学及其各个具体学科的范畴，只要能达到反映军事整体的本质联系高度的，也可加以借用或改造而成军事哲学范畴；③在军事哲学研究中，可通过对各门具体性军事学科的范畴加以概括、抽象，以形成军事哲学自身的专用范畴。正是这些

由移植、改造和抽象而来的一系列范畴，共同构成了军事哲学的范畴体系。

军事哲学的体系建构问题。由于人们所确定的军事哲学逻辑起点不同，以及构成理论体系时所遵循的原则、方法的区别，因此在建构军事哲学理论体系时就出现了多种方案纷呈的现象。如：有的围绕保存自己与消灭敌人的矛盾，先从宏观上、总体上对战争进行考察，再就战争力量的要素、建设与使用加以具体分析，然后又回到从战争的认识与指导上如何解决这一矛盾，从而形成整个体系；有的以战争规律为中心来构成体系，认为该体系应包括战争的社会历史规律、战争诸因素相互关系的规律、战争认识规律、战争力量的建设与运用规律、军事科学的发展规律等部分；有的把战争目的与手段的关系问题视为中心，先是对战争目的的总论，次讲实现战争目的的手段，最后论述解决战争目的与手段之间矛盾的基本方法，从而构成整个体系；有的把立足点放在对军事实践活动的本质及其一般规律的探索上，其体系主要包括了战争是军事实践的基础、作战行动是军事实践的生动体现、国防建设是和平时期军事实践的主要内容、军事科研是军事实践的理论升华等方面。《军事哲学》则明确提出：应遵照实事求是、高度概括、符合逻辑、系统优化的原则，运用理论与实际、历史与逻辑、抽象与具体、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思考军事哲学的体系构成问题。据此，该书以“敌我对抗”作为逻辑起点，运用一系列的重要范畴，确立了由军事本质论、军事运动论、军事认识论、军事指导论与军事哲学方法论等“五论”为基本部分构成的军事哲学理论体系

军事哲学的若干立论问题。有关军事哲学的一些基本观点与原理，中国学术界的认识有许多是一致的，但也有些方面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例如：①战争的起源。有的坚持“阶级起源论”,有的坚持“利益冲突论”，还有的坚持“多因素作用论”。《军事哲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学》认真考察了战争起源的历史事实，得出了战争源于“敌对双方在经济、政治利益上的对抗”，原始社会战争与阶级社会战争“有着历史的必然联系”，而“作为两种不同社会性质的战争又是有区别的”的结论；②战争与军事的本质。有的坚持“战争始终是政治的继续”，有的觉得“核战争不再是政治的继续”，有的认为战争与军事的本质是“指阶级性与暴力性两个方面”，还有的提出战争有“经济本质”、“政治本质”、“军事本质”的多重性。《军事哲学》对这个问题的基本见解是：“战争乃是敌对双方为了一定利益而进行的暴力对抗活动”，就战争的性质而言“永远是政治的继续”，这一原理“对于核战争是同样适用的”。但军事“系指以准备、实施战争为中心的直接相关的社会活动”，它既“以战争为核心”，又“不等同于战争”，军事的本质“是由贯穿于军事领域的基本矛盾决定的”，表现为“暴力性与非暴力性的统一”；③军事认识中的理性与非理性因素。长时间以来，人们并不重视非理性因素在军事认识中的作用，有的甚至认为“这是唯心主义的东西”。《军事哲学》就这个问题专门进行了考察，认为军事心理因素与非逻辑形式等非理性因素，在军事认识中是种“客观存在”，“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同时又不能将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截然分开，“理性因素制约非理性因素，并在军事认识活动中起主导的决定作用”等；①军事客观规律与军事指导规律。就其关系而言，一种意见认为两者没什么区别，另一种意见认为两者有着完全不同的依据和表现。《军事哲学》则明确提出：“不仅存在客观的军事规律，还存在着军事指导规律”，而且军事指导规律是对军事客观规律的“自觉遵循”、“灵活运用”、“近似反映”；⑤军事哲学方法与其他科学军事方法。在诸多的军事哲学著作中，往往都认为一般的科学军事方法皆属于方法论的范围，因此理应包括在军事哲学体系之中。《军事哲学》一书，对军事哲学方法同其他科学军事方法的联系与区别作了分析，认为军事哲学理论体系只应

包括军事哲学方法论的内容，但军事哲学方法必须同其他科学军事方法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发挥其方法论的作用。

军事哲学的基本功能问题。军事哲学究竟是怎样起作用和实现自身价值的呢？概括起来学术界不外乎有两种争论的意见：一种是“直接作用论”，认为军事哲学既然是关于军事实践与认识活动总的知识体系，就应对军事活动的各个方面起到直接的指导作用，因而主张军事哲学的研究、学习必须同具体的军事活动联系起来，着力提高其应用性和可操作性；一种是“间接作用论”，认为军事哲学是关于军事世界的性质与规律的总认识，不需要去回答军事实践与认识活动中出现的各种具体问题，而只要帮助提高人们的理论思维能力就可以了，因此主张充分发挥其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理论先导功能。《军事哲学》针对这些看法，认为对军事哲学不能简单地去强调“直接”或“间接”起作用，而要充分认识军事哲学功能、作用的广泛性、多面性与综合性，它“不仅可以帮助人们确立科学的战争观、军事观，借以提高军人的科学思维能力，而且还可以自觉运用根本的军事方法论，来能动地指导各项军事活动，并对哲学与其他科学发展起积极的促进作用”。

军事哲学的发展方向问题。尽管有关这方面的著述、论文相对少一些，但在各种军事哲学研讨会和院校军事教学中，还是经常议论到这个问题。有的看法比较一致，如应加强军事哲学基本理论的研究，针对所存在的各种问题展开深入讨论，进一步充实、完善内容和整个理论体系，更好地为军队建设、国防建设和未来作战服务，等。然而，当具体到评价、途径与趋向等方面时，见解却不尽相同，出现了种种相左的意见。例如：对现有军事哲学理论的评价和是否需要更新的问题，有的认为它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总结了古今中外军事活动规律而形成的，谈不上什么更新；有的则认为军事哲学思想始终随着人类社会与军事领域的发展而发展着，无论是内容与体系都要不断丰富、完善

以至革新。那么通过什么途径才能使军事哲学适应时代的要求呢？有的认为应从加强基本理论着手，有的则不同意这种看法，觉得军事哲学在理论上的深化固然重要，但更为迫切的是如何使军事哲学走向实践和群众。至于军事哲学下一步发展的趋向，有的提出应在军事本质论、军事认识论、军事指导论、军事价值论和军事哲学思想史等分支学科上下功夫，有的则认为军事哲学还是一门不太成熟的新学科，现在就谈发展分支学科尚为时过早，等等。关于这些问题，《军事哲学》在结束语中进行了专门的探讨，总的认为“军事哲学将面临军事领域革故鼎新的新形势，跟上时代、开拓前进、更新内容，更卓有成效地为军事活动服务，乃是今后势在必行之事”。为此，具体作了五个方面的阐发：一是“适应军事领域革故鼎新的形势，军事哲学将更富有时代感并积极发挥指导作用”；二是“针对客观需要和学科现状的矛盾，军事哲学必向新的广度和深度开拓前进”；三是“通过吸收哲学和各类科学的最新成果，军事哲学的内容和形式会更加丰富多彩”；四是“随着理论与实际之间联系的加强，军事哲学将愈来愈为更多的人所掌握和运用”；五是“广泛地运用现代科学研究方法，军事哲学研究必将进一步趋于精确化与科学化”；等等。

需要指出的，虽然自《军事哲学》一书出版之后，直到 20 世纪结束的时候，尚未见到再有新的全面、系统阐发军事哲学理论体系的论著问世，但随着我国新历史时期建军实践的发展、高技术战争形态的出现和新军事革命问题的提出，有关这些方面哲学思考的专著和论文还是不断涌现的。例如，《高技术战争哲理》就是一部从军事哲学的视角研究、考察高技术战争的专著，它从“启示与辨析”、“本质与特色”、“类型与转化”、“潜力与实力”、“时间与空间”、“技术与战法”、“进攻与防御”、“一般与特殊”、“耗费与效益”、“现代与未来”十个方面，探讨了高技术战争的基本特性与基本规律；《新军事革命论》一书，是在大量运用国内专

家、学者对军事革命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编撰而成的，它不仅就这场革命的内涵、时代背景、根本动因以及对军事领域的各种影响作了分析，而且面对新的军事革命进行了理性思考；《新战争论》是以人类社会发展到信息社会作为大背景，来考察当代与未来战争发展趋向的专著，其重点是“谈论信息战问题”，但还提出了“思维战”观念，作者认为“信息战的精华是控制，控制人的思维，这也就是思维战之生命力所在”。另外，在解放军报、《中国军事科学》、《军事学术》、《外国军事学术》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有关军队建设、高技术战争与新军事革命的理论性文章，其中不少蕴涵有丰富的军事哲学思想。尤其是解放军报，在本世纪最后一年里，就有关“知识军事”的问题展开了讨论。尽管关于“知识军事”的概念在学术界存在不同的看法，有的赞成这个提法，有的觉得不要把“知识经济”套过来变成了“知识军事”，但有一点是共识的：在当代与未来社会里，“知识”在军事领域的地位与作用会愈来愈高，这将深刻影响到新军事革命和未来战争的各个方面。毫无疑问，在人类进入 21 世纪的时候，军事哲学研究的前沿，正是人们如何去认识和思考军队建设、高技术战争、新军事革命提出的一系列新问题，并不断得出能正确指导当代与未来军事活动的普遍性结论。

（1999 年）

谈军事哲学的学科性质问题

军事哲学作为一门新的学科，已逐渐为人们所普遍承认了。然而，有关这门学科的性质问题，比如其研究对象究竟指什么，应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科学理论体系，它属于哪一门类科学及其同其他学科是种什么关系，在军事活动中起到何种作用，等等，多年来在学术界众说纷纭，始终未能取得一致的认识。很显然，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能不能正确地、科学地加以解决，直接关系到这门新学科地位的真正确立、今后的发展方向和功能的充分发挥。本着探讨求真的精神，现就此谈点不成熟的意见。

一、正确把握军事哲学的研究对象

任何学科的性质，归根到底是由其研究对象的性质所决定的。正确把握军事哲学的研究对象，是剖析军事哲学的学科特性的客观基础。

什么是研究对象呢？通俗点说，它不外乎是人们对要认识与研究的客体范围所作出的一种界定。没有明确界定的研究对象，就势必造成各门学科的无的放矢和相互间的杂乱重叠。关于怎样来界定研究对象的问题，毛泽东早提出了正确的原则：“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了某一门科学的对象。”[1] 乍看起来，似乎确定一个研究对象并非难事。其实不然，因为世界上任何一个复杂事物或领域，并不由单一的方面、层次、

[1]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09 页。

部分构成，总具有多种多样的矛盾与性质，要想全面把握它们，仅从一种角度来研究是远远不够的。这就造成了同一认识客体，往往要求人们针对不同矛盾属性与问题，从不同的视角与运用不同的方法来加以探讨的情形。比如对于战争，除了军事科学之外，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民族学等等也要进行研究，而且这些科学下面还有诸多的分支学科。尽管战争这一特殊社会现象成了诸多学科研究的共同领域，但针对不同的矛盾特性却各有各的研究内容与课题。可见，区分研究对象同区分事物种类不太一样，需要作认真细致的深层分析。

同样的道理，确定军事哲学的研究对象，亦决非笼统说是战争或军事就可以了，因为战争或军事毕竟是个复杂的领域，需要各种学科分别与综合地进行研究。军事哲学究竟以战争或军事的哪一部分、哪一方面、哪个层次、哪种矛盾作为研究对象的问题，需要在弄清战争与军事的确切涵义及其诸多性质的基础上，来加以明确界定才行。所谓战争，通常都认为指敌对双方有组织的武装斗争，在内涵与外延上大家的认识相对比较明确，故在此不用赘述。而关于军事，不仅世界各国有不同的解释，即使国内也有各种不同的理解。我们这里所说的军事，系指以准备、实施战争为中心的直接相关的社会活动。之所以要特意加上“直接相关”的限制词，是考虑到如果不对“活动半径”有所限制的话，很容易把“军事”的范围无限度地扩大，尤其在战争时期更是如此。显然，军事与战争有着密切的联系，军事离不开战争，要以战争为中心，既晚于战争的出现而又大于战争的范围。这也就告诉人们，军事哲学作为反映整个军事活动的哲学思想，仅仅研究战争本身并不够，还必须研究以此为中心的各项直接相关的社会活动。

但问题在于，军事这个领域是如此之庞杂，不从各个方面来加以考察、研究就无法全面把握它，军事哲学只能担负其中的一部分任务而已。然而在选取军事哲学的研究对象时，搞得不好可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